

孙中山与香山翠亨杨氏

① 黄健敏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得到许多香山籍同乡的支持和帮助。^① 这些香山同乡中不少人是属于同一个乡村和宗族的，父子、兄弟、叔侄一起参加革命，成为孙中山革命追随者的群体中值得关注的现象。笔者近年颇留心香山大族与近代中国相关史事，曾撰《孙中山与香山南朗程氏——以南朗〈程氏族谱〉的资料为中心》，对孙中山与同属香山南朗程氏一族的程璧光、程奎光、程耀垣、程耀臣、程蔚南、程君海、程北海、程天斗等人物的关系进行重新梳理和研究。^② 本文则拟利用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藏文献及口述资料，对另一个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宗族——翠亨杨氏宗族展开初步的研究。

一 翠亨杨氏与孙氏

孙中山的故乡翠亨村位于香山县东南面，珠江口西岸，北距县城石岐20多公里，南到澳门约30公里。翠亨村是一个包括杨、陆、冯、孙、陈、何、麦、苏、梁等多姓氏聚居的村落，在孙中山的童年时代，全村不过六

① 香山县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建县，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民国十四年（1925年）4月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改名中山县，所辖范围大概包括今日中山市、珠海市、斗门县的大部分以及番禺、顺德、新会的一些地区。1953年从原中山县划出部分地区与原属东莞、宝安的若干海岛合并成立珠海县。1965年又从原中山县、新会县划出部分地区成立斗门县。1983年中山县撤县建市（县级市），1988年升格为地级市。孙中山的香山籍革命追随者的一般情况，参见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与香山相关人物集》，2004年11月印行。

② 黄健敏：《孙中山与香山南朗程氏——以南朗〈程氏族谱〉的资料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七十户人家。

翠亨杨氏分超健祖（寅庵祠、兼善祠）、仰仙祖（仰仙祠）两支。

据记载超健祖房情况的翠亨《杨氏家谱》载：“十五世祖起茂公，字起茂，云高公子，生于清康熙二年（1663）乙未九月二十三日，卒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甲午，享寿六十岁。……公由隔田始迁居翠亨村。”^①这段记载其实并不准确，康熙二年是癸卯年，最接近的乙未年是顺治十二年（1655）；康熙六十一年是壬寅年，最接近的甲午年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尽管记载不甚确切，但可推测起茂公迁居翠亨村当在清康熙年间。在清代“隔田”包括启运里、敦和里、和星里三个聚落，杨氏聚居的是启运里（即今中山市南朗镇崖口管理区杨家村）。

仰仙祖房则没有族谱传下，但他们亦认同祖上自隔田迁入翠亨。至于始迁祖及迁入时间则有两种说法。其一，据说仰仙祖房的祖先叫杨超寰，与超健祖房的祖先杨超健是亲兄弟。^②但据《杨氏家谱》载，17世祖杨超健是16世祖杨有辉独子，并无兄弟。^③另一种说法则是仰仙祖房的祖先杨国盛（从隔田算起是第19世祖）可能在1810年左右才从隔田迁居翠亨，第20世祖杨仁辉大约在1838年左右在翠亨置产建筑家祠。^④后一种说法似乎比较可靠。

杨氏家族的发展可从翠亨村祖庙北极殿道光八年（1828）、咸丰六年（1856）、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次重修的碑文约略观之。翠亨各姓中，陆氏于明代嘉靖年间定居翠亨村，是现在翠亨各姓中最早迁入定居的姓氏，陆姓也是翠亨村早期实力最强的宗族。^⑤道光八年（1828）重修翠亨祖庙北极殿，村民陆仁车一人捐银52两，已是杨氏列名捐款的23个族人捐银总和约23两的两倍多。^⑥此一时期，翠亨杨氏也已开始迅速崛起。19世祖杨达勋及其弟杨兆勋是关键人物。杨达勋（名廷英，号兼善），生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道光二十二年由俊秀报捐从九品敕授登仕佐郎候选巡政司……于咸丰九年间晋封中议大夫”，卒于清咸丰九年（1859）。

① 林介眉编《翠亨》《杨氏家谱》，1933年编印，第22页下。

② 2006年11月13日，笔者采访翠亨村民杨帝俊（67岁）记录。

③ 《翠亨》《杨氏家谱》，第23页下。

④ 据〔美〕杨帝霖编《杨德初家族世系表》（稿本），1995年2月。杨鹤龄儿媳林冠群女士提供。

⑤ 参见陆仁协等修《重修香山隔田河南郡陆氏族谱》，清同治元年（1862），抄本。

⑥ 《重修翠亨村祖庙碑记》，道光八年（1828）。原碑存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杨兆勋（名廷麟，号瑞圃），生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于“清道光二十二年例授登仕佐郎”，卒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杨达勋与杨兆勋是杨氏在翠亨定居之后最早捐得功名的族人。道光年间，两人召集子侄，主持建造翠亨杨氏的第一座祠堂——寅庵公祠（杨寅庵（1741~1809），字协卿，是杨达勋与杨兆勋的父亲）；他们又携旧存家谱往香山县城南关杨族认识宗亲，并在南关杨族抄回连隔田杨氏都说不清楚的始祖元规公历传世次，同时搜集父老所述，“启木主或拂蠹而搜残篇”，重建家族的历史，编撰翠亨杨氏“第一部系统的家谱”。^①通过建宗祠、认宗亲、编家谱，可以说翠亨杨氏家族是在此时才正式“建立”起来，也逐步在翠亨村确立大族的地位。这个时期正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生“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现在已无法清楚杨族的急速崛起的细节，但无疑与这个时代机遇是密切相关的。翠亨杨氏一族从这一代开始“兴旺”起来的，捐纳得功名的族人，第19世除杨达勋和杨兆勋之外，据族谱载，杨业勋是“诰封朝议大夫”，杨尧勋是“皇恩例授登仕郎”，杨元勋是“皇恩例授登仕郎”，但族谱中完全没有提及这些杨家族人有什么科举功名，很明显这些官衔都是捐纳得来。到咸丰六年（1856），翠亨村祖庙北极殿第二次重修时，杨族已经占尽上风。最为突出的是杨达勋的三个儿子：杨启文、杨启操、杨启怀，他们三兄弟捐银数已占全村村民捐银总和的1/3。^②

翠亨孙氏十四世祖孙殿朝（1745~1793）大约于清朝乾隆年间从附近南涌口村迁入翠亨村定居繁衍。^③孙氏家族在翠亨村并不算大族，人口最多的时候也不到10户，世代以务农为生，在翠亨村也未建有祠堂。但在道光八年及咸丰六年两次重修村庙中，孙氏均以四大族代表之一跻身重修值理之列。在道光八年重修村庙，翠亨孙氏捐款共有6人，捐银总和约3两多。孙氏族人中捐银最多的是孙中山的祖父孙敬贤（1789~1850），孙敬贤以承继祖田十余亩为生，笃信风水之说，曾管理翠亨孙族公尝，此时能捐银1两给祖庙，可见经济尚较宽裕。咸丰六年重修村庙，孙中山的堂伯祖孙尊贤作为孙族代表担任值理。从记载清道光廿八年（1848）到咸丰四年（1854）间翠亨孙氏家族活动的开支的祖尝账册上可见，孙氏家族基

① 参见杨廷英《杨氏家谱序》（道光二十五年），（翠亨）《杨氏家谱》，第2页上。杨达勋及杨兆勋生平，参见（翠亨）《杨氏家谱》，第25页上~26页上。

② 《三修翠亨村祖庙碑记》，咸丰六年（1856），原碑存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③ 参见（翠亨）《孙氏家谱》（稿本），约民国初年。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本上每年都会举行“隔年”、“清明”（祭祖）等活动，每年族事支出也不过几两白银，每次家族聚餐用米不过一两斗，可见人口不多；聚餐的菜主要是猪肉（少则两三斤，多则十多斤）、咸鱼、塘鱼、虾米、茨菇、鸭蛋、蔬菜、咸菜等，这样的菜色在当时的农村也算不上丰盛，广东人有“无鸡不成宴”的俗语，但在账册中却看不到鸡的记载。^①可见孙氏家族经济状况平平，自不能与杨族相提并论。

翠亨村是一个杂姓村，各族之间尚能和谐相处。过去同村即使不同姓，也甚少通婚，所以翠亨孙氏与杨氏也从无通婚记录。倒是翠亨孙氏与杨氏远祖先定居的隔田启运里（杨家村）的杨氏有通婚。孙中山母亲杨氏就是隔田人，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也嫁给了隔田村民杨紫辉。翠亨杨氏虽自隔田迁出200多年，但与隔田杨氏关系依然密切。隔田乡《杨崇德堂家谱》（清光绪二十四年抄本）“弘农堂家谱小引”载“应祥祖同子敬修公父子卜迁于东门外大字都波罗村暂然居住，后乃卜择隔田乡以为基址，自开民籍大一七甲老户杨文聪图分”。翠亨《杨氏家谱》“五世祖应祥公”条下中记载“广东广州府香山县大字都一图七甲户丁杨文聪开爪，兼善大业爪，瑞圃兴业爪”。也就是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翠亨杨氏和隔田杨氏仍在同一个“户”名（杨文聪户）下纳赋税和应役，翠亨杨氏直到“兼善”、“瑞圃”的时代才从杨文聪户下分爪，独立承担赋役的责任。^②

二 “官吏和三个有钱兄弟”

林百克的《孙逸仙传记》第九章“官吏和三个有钱兄弟”记载了一件孙中山童年亲眼目睹印象深刻的事情。这件事简单概括是这样的：翠亨村有富有的杨氏三兄弟，在村中筑有豪华的住宅和花园。某一天，忽然有数十个“满清”士兵和衙役冲进他们的住宅和园子里，以非法致富为理由把他们拖出来，并强占他们的财产和家宅，杨家其中一个兄弟还被处以斩首死刑。村人都认为他们的财产来源正当，对清兵掠夺他们财产的暴行，村

① 参见《翠亨孙氏祖尝账册》，清道光至咸丰年间，抄本。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邱捷：《翠亨孙中山故居文物的社会史解读》，《历史人类学学刊》第四卷第二期，2006年10月。

② 翠亨杨氏与隔田杨氏之关系，参见黄健敏《伶仃洋畔乡村的宗族、信仰和沿海滩涂——中山崖口村的个案研究》，中山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10年6月。

民都私下愤恨，而不敢公然反抗。童年的孙中山却勇敢地跑到三兄弟的院子里并质问“满清”官吏表达抗议。^①

这“三个有钱兄弟”，就是上文曾经提到过的杨达勋的三个儿子：杨启文、杨启操和杨启怀。关于杨氏三兄弟，翠亨《杨氏家谱》有如下记载^②：

二十世启文公，讳承光，字启文，号丕谷，达勋公四子，清诰授中议大夫，钦加三品衔，福建试用同知，赏戴花翎，生于清道光五年乙酉九月初七日酉时，卒于清宣统元年己酉五月二十八日未时，享寿八十五岁。

二十世启操公，讳显光，字启操，号耀堂，达勋公五子。前清因克复嘉应州案内保举钦加知府衔，赏戴花翎，选用同知，诰授朝议大夫。生于清道光八年戊子十一月初一日戌时，卒于清光绪十一年乙酉正月初四日丑时，享年五十八岁。

二十世启怀公，讳俊光，字启怀，号冠千，达勋公六子。前清诰授奉政大夫，候选同知。生于清道光十一年辛卯十月初五日酉时，卒于清同治十三年甲戌五月二十九日酉时，得年四十四岁。

杨氏三兄弟是当时翠亨村最富有的人。他们在村中分别建起三进三开间的大宅，其中杨启文的住宅（俗称“四宅”）及杨启怀的住宅（俗称“六宅”）至今仍存，并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翠亨村的传统保护建筑。杨启怀的住宅后还附建占地颇宽的私家花园“韵园”，亭阁建筑与岭南花木杂存，是当时翠亨村中最漂亮的景观，也是孙中山童年经常流连的玩乐之所。可惜韵园今已不存，仅余当年园内的数株红棉和桃榔树供人想象昔年的繁华。杨氏三兄弟还为父亲杨达勋（号兼善）建起三进三开间附两路副屋的兼善杨公祠，以堂皇的气势显示家族的富有。^③

杨氏兄弟如何致富，到现在还不能说是一个很清楚的问题。《孙逸仙

① 参见林百克著《孙逸仙传记》，徐植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3~14页。杨氏三兄弟被抄家的事也在翠亨村民间广泛流传，参见李伯新《孙中山史迹忆访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1996年10月编印。

② 《翠亨》《杨氏家谱》，第30~32页。

③ 杨启文宅、杨启怀宅及杨兼善祠的建筑情况，参见黄健敏《翠亨村》，文物出版社，2008，第61~65、73~76页。

传记》说这三兄弟：“他们本来是穷的，但是后来富了。他们致富之由，是从勤俭坚忍得来的。”^① 这种说法，显然是为了配合叙述后面清兵的蛮横无理而塑造出来的。正如上文所说的，杨氏兄弟的父亲杨达勋是杨氏家族崛起的关键人物，捐得“中议大夫”的官衔，并主持建造祠堂，家境似不应太差。根据翠亨村民的忆述，这三兄弟财富主要是在汕头一代俗称“卖猪仔”（即外洋劳工贸易）而得来，因在外触犯官府，而被查抄。^②

事件中被斩首处死的杨家兄弟是杨启怀，杨启怀卒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二十九日。另据翠亨村民回忆，杨启怀在清兵到翠亨查抄杨氏三兄弟的产业时已被杀。^③ 一般来说斩头与抄家两事发生的时间应该相距不远，则孙中山忆述的此事发生时间应该就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当时孙中山才8岁。

杨氏三兄弟被清兵抄家及杨启怀被斩首，在当时的翠亨村是一件大事，也给童年的孙中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他认识及反思“满清”政府及其统治下的社会的一次重要体验。孙中山曾经告诉林百克：“自从三兄弟的悲剧演了之后，他很注意到权力的意义。谁把打人锁人的权利给残暴的官吏的？是不是因为官吏是强有力而带武器，还是另外有别人有比较他所给的暴力更大的力量？谁是发令斩决三兄弟中的一个和囚其余两个在牢狱的人？”

“卖猪仔”所得的财富可说是杨氏三兄弟的“第一桶金”，经历这场官司之后，杨启文及杨启操等都把商业活动的基地转移到港澳。杨启操据说在港澳开办“金山庄”（经营华侨汇兑的金融组织），同时还有许多产业。杨启文与杨启怀均与长期垄断太古洋行华人买办的会同莫氏家族结为姻亲，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杨氏三兄弟生意业务转型的一些信息。在讲究门当户对的当时，能够与大洋行买办结为姻亲也说明杨氏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不弱。杨氏三兄弟的子女及女婿各有所成，分布政、商及医学、建筑等各界，在省港澳地区建有广泛的网络，其中一些亲属还和孙中山有或多或少

① 《孙逸仙传记》，第13页。

② 参见《1959年李伯新访问翠亨村民陆天祥（83岁）记录》、《1964年5月13日李伯新访问陆天祥（88岁）记录》、《1962年5月24日李伯新访问孙中山甥孙杨连合（48岁）记录》、《1978年2月24日李伯新访问杨连合（64岁）记录》，《孙中山史迹忆访录》，第61、76、83~84、96页。

③ 《1965年8月18日李伯新采访翠亨村民谭金兰（62岁）记录》，《孙中山史迹忆访录》，第142~143页。

的关系。

杨启文生有10子10女，多捐纳得官衔。杨启文的长子杨汉川（1856～1902）为“清敕授职佐郎，候选训导，廪贡生”，据说孙中山曾随其进修国学。第十子杨锡宗为近代岭南著名建筑师，参与设计不少孙中山纪念建筑（详后）。杨启文第六女适香山会同（今珠海金鼎镇会同村）莫仲逵，会同莫氏为近代著名买办家族，莫仕扬、莫藻泉、莫乾生祖孙三代连任香港英资四大洋行之首的太古洋行华人买办半个多世纪。莫仲逵长期主持莫藻泉创办的“南泰号”商行，经营南北贸易和轮船揽载业务，在东南沿海口岸形成庞大的货源、客源网络，还参与契约华工的招收活动。^①杨启文第十女适三水胡禧堂（？～1932），胡禧堂绅士亦曾任太古买办，与何东爵士合办内河船运业务，后任香港华商总会总理。^②

杨启操的第四子杨鹤龄是孙中山最早的革命支持者之一，与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并称“反清”“四大寇”之一（详后）。杨启操第七女适香山北岭吴捷薇（吴节薇）。吴节薇是澳门著名绅商。1892年，孙中山在澳门向镜湖医院借银开办中西药局，“担保还银人”就是吴节薇。杨启操第九女杨舜华（1884～1951）适番禺关心民。关心民（1877～1955），名景星，香港西医书院肄业，北洋西医学校毕业，曾任天津营口卫生局总办。1904年以大使随从医官随议约全权大臣唐绍仪赴印度，与英国商议西藏事宜。由文童官学生历获奏保以道员赏戴花翎加二品衔。^③关心民七兄关景良（1869～1945）是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同班同学，并同室而居数年。孙中山与关家关系密切。孙中山介绍檀山归侨李月娥（1876～1905）嫁与关景良，并担任其证婚人。^④1913年关心民派办广东省盐务稽核分所所长，据说也与孙中山力荐有关。^⑤关心民之父关元昌（1832～1912），是香港首位华人注册牙医，有“中华牙医始祖”之称，孙中山曾认关元昌为

① 徐松荣：《莫仕扬（附莫藻泉、莫乾生）》，张耀中主编《珠海历史名人》（二卷），珠海出版社，2004，第23页。

② 参见维基百科“胡百全”词条（<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3%A1%E7%99%BE%E5%85%A8>），2011年5月13日检索。

③ 容应英：《香港开埠与关家——基督教之传播与关元昌一族》，关肇硕、容应英：《香港开埠与关家》，（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第14页。

④ 参见简又文《国民革命文献丛录》，《广东文物》（影印版），上海书店，1990，第431～433页。

⑤ 关肇硕：《中华牙医之父与国父孙中山》，《香港开埠与关家》，第51页。

义父。关家亦是香港著名的基督教家族。^① 关心民八姐夫容星桥（1865 ~ 1933）及其堂兄容闳（1828 ~ 1912）亦是孙中山革命得力支持者。^②

杨启怀的长女适香山会同莫藻泉，莫藻泉（1857 ~ 1917）1879年起担任香港太古洋行第二任华人买办，任内拓展中国沿海沿江航运业，开设大量分行和代理机构，并创立太古船厂、太古船坞及太古仓等大型工业企业。^③ 杨启怀第四女适香山南屏（今珠海香洲区南屏村）陈景华（1865 ~ 1913），陈景华清光绪十四年（1888）中举，历任广西荣县、马平、贵县、桂平等地知县。后因惩办受招抚的盗魁陆显而被革职扣押并奏请正法。后陈景华逃亡香港，复转赴暹罗（今泰国），接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投身“反清”、反保皇党斗争，由清王朝的叛臣转变为民主革命的战士，并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清宣统三年（1911），胡汉民就任广东省都督后，先后委任陈以民政司司长与警察厅长之职。^④

三 翠亨杨氏与辛亥革命

翠亨杨氏不少族人追随孙中山，参与辛亥革命，作出贡献。

（一）杨鹤龄

杨鹤龄（1868 ~ 1934）是杨启操第四子，自小随在港澳经商的家人生活，甚少回乡。因此孙中山与杨鹤龄虽是同乡，但却是孙中山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时由同乡兼同学的谭虚谷介绍才熟悉的。^⑤ 杨鹤龄曾师从岭南大儒简朝亮，又就读于广州算学馆，与尤列为公司，后随家人在香港歌赋街经商，开设有“杨耀记”商店。孙中山就读于香港西医书院时，课余常与杨鹤龄、陈少白、尤列等在“杨耀记”后楼相聚，“听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来往密切，非谈革命无以为欢，其中最为仰慕发起太平天国起

① 参见《香港开埠与关家》，第7~10、48页。

② 参见李吉奎撰《容星桥》及徐松荣撰《容闳》，张耀中主编《珠海历史名人》（首卷），珠海出版社，2001。

③ 参见徐松荣《莫仕扬（附莫藻泉、莫乾生）》，《珠海历史名人》（二卷），第21~23页。

④ 参见邱捷《陈景华》，《珠海历史名人》（二卷），第59~64页。

⑤ 《1965年9月20日李伯新访问孙中山甥孙杨连合（51岁）记录》，《孙中山史迹忆访录》，第88页。

义的洪秀全。古人称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太平天国起义最终失败，清政府视洪秀全为寇，他们谈论时说，我们的志向，和洪秀全一样，于是便笑称自己为“四大寇”。^①这期间，陆皓东、郑士良等来往广州、上海经过香港时，也常常在“杨耀记”暂住，与“四大寇”经常聚谈“反清”言论，因此“杨耀记”商店后来被称为“革命党人最初之政谈俱乐部”。^②

1892年，孙中山在澳门向镜湖医院借银开办中西药局，“担保还银人”是杨鹤龄的妹夫、澳门绅商吴节薇。后孙中山在澳门受到排挤，转往广州及香山石岐开设药局，但手头拮据，据杨鹤龄之子杨国铿回忆，当时杨鹤龄曾变卖位于澳门龙嵩街的一所房子与吴节薇，所得资金全数赠给孙中山作发展事业之用。^③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杨鹤龄则在港澳一带协助筹募经费及作“反清”宣传，一度在陈少白创办的革命报刊《中国日报》中任职。民国成立后，杨鹤龄隐居澳门，并把居所命名为“杨四寇堂”，以纪念这一段革命往事。

1919年5月16日，闲居澳门的杨鹤龄曾致函孙中山，希望为革命效劳，信中说：“自我公乙未举事以来，此身思为公用，望之数十年矣。此数十年中因孙党二字几乎无人敢近，忍辱受谤，不知几极。弟又平素不善治生，上下无脚，竟成废弃，深为自惜。今者国家多事之秋，如弟之宗旨不变，诚实可靠，若用作奔走，用作心膂，赵冲国所谓无如老臣者，弟亦云然矣。”孙中山收信后，批复：“函悉，此间现尚无事可办，先生故闭户著书；倘他日时局转机，有用人之地，必不忘故人也。”^④

1921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时，就聘请杨鹤龄为总统府顾问，并每月馈赠五百元作为养老金；又把越秀山南麓文澜阁修葺一新，延请杨鹤龄、陈少白、允列三位“四大寇”时期的革命元老居住。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越秀山。孙中山转赴上海，杨鹤龄则回到澳门。

1923年1月9日，杨鹤龄再次致信孙中山，信中说：“近观大局，知

① 参见《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第229页；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别录》，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83页。

② 冯自由：《华侨开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47，第2页。

③ 参见杨国铿《忆述父亲杨鹤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辑》（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④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中华书局，1991，第1177页。

已大有转机，广东三千万同胞，日日望公解决，非如前岁之情况矣。老夫睹此，大有雄心，极欲服务民国。……始谋有我，而收效岂无我乎？嗟乎！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想我公必不便四皓永匿商山，二老长居东海也。”也许是此信的后半段引起孙中山不快，孙中山收信后，批复拒绝了杨鹤龄的请求：“真革命党，志在国家，必不屑于升官发财；彼能升官发财者，悉属伪革命党，此又何足为怪。现无事可办，无用于长才。”^① 1923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4月4日，杨鹤龄被任命为港澳特务调查员。^②

杨鹤龄衷心敬佩孙中山的革命言论和为人处世，晚年最喜欢书写“天下为公”及“博爱”赠与友人。他在所书的“天下为公”下常常写上“昔仲尼言之，而志焉未逮，吾友逸仙言之，有志竟成，逸仙贤于仲尼矣”一段话；而在所书的“博爱”下则常常写上“中山先生喜书此二字，蒙作效顰也，亦景仰流风之意耳”，可见他对孙中山的景仰和钦佩。^③ 杨鹤龄性情诙谐，别人问起他的革命事迹时，常以“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为由婉言谢绝，而对于革命先烈的亲属后裔则时时关顾，现在还保存下来多封他要求为黄咏商、林喜智、程耀臣、谭弼、朱贵全、邱泗、郑弼臣、杨衢云等建墓立碑及抚恤遗族的信函。

晚年蛰居澳门的杨鹤龄，“蒿目河山，曾无片好，中原多故，外侮频仍”，忧国之心日重，时时借酒消愁，举杯轰饮，醉后“时发牢骚之谈，痛斥执政者日非”。^④

1934年，杨鹤龄在澳门病逝，后安葬于家乡翠亨村金槟榔山麓，墓前遥瞰翠亨村孙中山故居，墓侧立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的褒恤令，褒扬杨鹤龄“性行高洁，器识宏远，早岁助勤总理倡导革命，厥功甚伟。民国肇造，退隐家园，功成不居，尤足矜式。”

（二）杨心如

杨心如是孙中山在翠亨村中的总角之交，他乳名帝镜，名兆蓉，字正

①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第1554页。

②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第1605页。

③ 杨鹤龄手书《博爱》、《天下为公》横幅。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④ 参见陈春生《革命先进杨鹤龄先生事略及其有关党史之遗墨》，（台）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原件。

乐，同治七年（1868）生于翠亨村，比孙中山小两岁，家中世代务农，后其兄贸易外洋，家境饶裕。

杨心如从小胸怀大志，好读书，聪慧过人，过目不忘，但不喜欢读“四书五经”，亦无意走科举考试之途，常和孙中山相与倾谈天下兴亡事，见解独到，多中肯綮，被孙中山引为知交。1895年，孙中山与革命同志创立兴中会，杨心如与岳父程耀臣在杨鹤龄的劝说下响应加入。杨心如奉命奔走中山、澳门、香港、台湾诸地，策动力、物力，参与广州起义、惠州起义诸役，“毁家纾难，产业十九捐助革命，家遂中落”^①。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杨心如岳父程耀臣被捕，“在狱多年，备受残刑，卒之瘐死狱中，为革命家散人亡”^②。而杨心如则转赴台北，在一家经营茶叶的良德洋行任司账。1897年，陈少白到台湾发展革命组织，通过杨心如结识当地爱国志士，于当年11月在杨心如家中成立台湾兴中会分会，这是革命党人在台湾建立的第一个据点。^③ 1899年，孙中山为策划近海革命根据地，远赴台湾，杨心如相随左右，初设联络机关于台北市新起町，后迁御成町梅屋敷，积极策划惠州起义。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转赴日本，而杨心如则留在台湾部署。其后黄花岗起义，杨心如奉召赴香港策应，失败之后，奉孙中山命继续留在台湾，建立革命基地。民国成立后，杨心如请示去留，据说当时孙中山本想把杨心如留在身边共谋国策，但因为台湾为海外联络要津，未可轻动。于是，杨心如和长子杨东瀛一起，在台湾以经营商业为掩护，和大陆革命同志暗通声气。其后“二次革命”倒袁、护法运动等，革命同志来往南北，多以上海、台湾、香港为联络所，台湾方面，杨如是实际的主持者。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杨心如一直留在台湾。抗战期间，他关怀国事，终日忧心忡忡，虽家人亦难交谈一语，内心苦闷可知。及至日本投降，台湾、澎湖宣告复归祖国，杨心如笑逐颜开说：“不图竟有今日，吾无憾矣。”孙科得知杨心如还在台湾，而又生活困顿时，马上函托当时的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对杨心如多加关照。杨心如常为抗战结束后中国的社会与

① 参见《杨心如先生行状》，撰者及时间不详。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② 《杨鹤龄致陈春生函》，（台）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原件。参见冯自由《兴中会组织史》，《革命逸史》第四集，第11、13页。

③ 参见王国璠《从杨心如先生生平探讨兴中会台湾分会》，1979年1月21日（台）《中华日报》。

政治现实而担忧，感叹说：“安得逸仙先生复生，兼收并蓄，和衷共济，以图建国耶。”1946年10月4日，杨心如在台湾病逝，弥留之际，对其子杨东瀛等说：“予随孙逸仙先生革命最早，言悔后死，今强寇已除，台湾光复，予向不善治家产，无一遗物，汝等或留台、或归乡均可。但须自立自强，勿辱邦家。”^①在杨心如的追悼会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致送题写“精神永在”的花圈，时任国民党台湾党部主委李翼中致送挽联：“是亦翠亨村人，少小追随，危难不渝，自有元功布方策；自定中华局后，孤羈退隐，沧桑几历，尚留老眼看升平。”^②

（三）杨德初、杨灿文父子

杨德初（约1838~1926）是翠亨杨氏仰仙祖房族人，1878年由香山经澳门、香港往夏威夷茂宜岛谋生^③，后成为孙中山长兄孙眉生意上的得力助手。1894年底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杨德初是较早加入兴中会的会员之一。^④1895年夏，杨德初与孙眉等合资铸造翠亨村北极殿铁钟。^⑤1907年9月，结束檀香山茂宜牧场事业的孙眉与杨德初等同往越南河内，与孙中山筹商善后诸事。^⑥1908年1月，孙眉与杨德初等在香港九龙牛池湾营建庐舍，以及从事种植果菜饲养鸡豚等工作。^⑦1909年冬，孙眉与杨德初等在牛池湾农场及香港湾仔冯自由宅缝制起义旗帜支持广东新军反正，数日内成三色旗百余幅。^⑧1910年9月，孙眉因运动劳工入党事，被港政府驱逐出境。遂与杨德初赴广州湾，“宣传革命，大招党人，高雷土人人会者，踵趾相接”。^⑨

① 参见《杨心如先生行状》，撰者及时间不详。

② 参见《杨心如翁追悼会昨晨于中山堂举行》，1946年10月24日（台）《民报》第五版。杨心如追悼会灵堂照片，杨心如亲属提供。

③ 据〔美〕杨帝霖编《杨德初家族世系表》（稿本），1995年2月。

④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商务印书馆，1948，第15~16页。

⑤ 参见翠亨村祖庙北极殿铁钟铭文，光绪二十一年（1895）。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藏。

⑥ 《老兴中会员郑照事略》，《革命逸史》第六集，中华书局，1981，第7页。

⑦ 参见《孙眉公事略》，《革命逸史》第二集，第7~8页；《老兴中会员郑照事略》，《革命逸史》第六集，第7~8页。

⑧ 参见《孙眉公事略》，《革命逸史》第二集，第8页；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20页。

⑨ 《孙眉公事略》，《革命逸史》第二集，第8页。

杨德初之子杨灿文（1879～1952），名华桐，字灿文，号凤廷^①，自小随父在檀香山长大。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杨灿文怀着激动的心情从檀香山写了一封英文信给孙中山，信中说：“你不仅是四万万同胞的恩泽，而且是你的家庭和我们翠亨人的光荣……自革命爆发后，在这个国家的华侨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去许多人是支持无能的满族皇帝的，现在成了积极的共和主义者。所有的人都紧跟革命运动，我们非常高兴听到革命同志的迅速成功的消息。群众集会表明我们对事态的关注，游行直接抒发了我们的喜悦。”^②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作为同乡深受鼓舞和自豪之情。民国成立后，杨灿文回到故乡翠亨村生活。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时，翠亨村民代表杨灿文与陆献山、陆兰谷等代表翠亨村民到广州，请孙中山从政府经费中拨款资助兴建翠亨学校的校舍。孙中山在热情接待乡亲之余，表示办学要靠群策群力：“满清是我们民众合力推翻的，希望你们各人都来出钱出力，合力来办好学校。”孙中山并题字“后来居上”送给他们以作勉励，此后这幅题字一直悬挂在翠亨杨仰仙祖祠里。^③

支持孙中山革命运动檀香山的翠亨杨氏华侨，当然不止杨德初和杨灿文。如杨贺（1866～1945），名官贺，字礼波，是孙中山的同龄人，据说曾为同学，后到檀香山谋生，并于1912年3月27日加入同盟会。^④此外还有杨锡初、杨培初等，至于名字和事迹都已湮没无闻的无疑更多。

（四）杨殷

杨殷是翠亨村孙中山革命追随者中比较特别的一位，他既积极参加过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又是著名的工运领袖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与彭湃被并称为“中国革命运动工农两巨星”。

杨殷（1892～1929），名观恩，字典乐，号命夔，其父杨汉川曾为孙中山国学老师。杨殷从小便听说过孙中山、陆皓东、杨心如、杨鹤龄等村

① 据杨帝霖编《杨德初家族世系表》稿本，1995年2月。

② 1912年1月15日，杨桐致孙中山英文函。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原件。中文译文是南开大学历史系邓丽兰副教授翻译。

③ 李伯新：《中山故居话当年》，《孙中山史迹忆访录》，第11～12页；孙中山“后来居上”题词墨迹现藏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④ 参见（翠亨）《杨氏家谱》，第55页；《杨贺同盟会员证》，1912。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人的故事。据说1911年初，年仅19岁的杨殷便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南方支部副支部长孙眉的安排下，经常来往广州、香港、澳门、香山等地，秘密从事传递军事情报及运送武器的工作。民国成立后，杨殷仍然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1913年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发动“二次革命”，杨殷积极支持，曾只身用炸弹把袁世凯的心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炸伤。1917年，孙中山南下广州建立政权，杨殷被安排在大元帅府参军处工作。杨殷精通技击拳术，常随孙中山出入，担任警卫职责。革命的几起几落，触动杨殷对革命的前途进行深入的思考。杨殷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新的希望，并于1922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与发动和领导了震动全国的省港大罢工及广州起义等，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告密，杨殷与彭湃等五位同志被捕，一周之后被秘密杀害。^①

四 杨锡宗与孙中山纪念建筑的设计

杨锡宗（1889~?），字礼绍，是翠亨村首富杨启文第十子，曾就读于广州岭南中学及北京清华学校，后赴美留学，1918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建筑科学士，毕业回国后，随即展开长达30余年的设计生涯。

杨锡宗是岭南乃至中国最早接受正规西方建筑学教育并回国服务的建筑师之一，他的设计生涯从折中主义、新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等各种形式的建筑风格都作出了许多积极的探索，见证了岭南建筑的近代化发展。杨锡宗的代表性建筑设计包括广州中央公园（现广州人民公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墓园规划、广州中山大学石牌新校园总体规划和第一期工程项目的设计、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广州银行华侨新村、嘉南堂（今广州太平南路新华酒店）、南华楼（今广州太平南路新亚酒店）等。^②杨锡宗擅长设计及绘画建筑图则，据说“每出一则，勾心斗角，立意必新，悬之国门，高下共赏，世人得其一纸，无不乐奉千金以为寿”^③。

① 杨殷烈士生平，参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翠亨红棉——纪念杨殷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文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

② 参见彭长歆《岭南近代著名建筑师杨锡宗设计生平述略》，《华中建筑》第23卷，2005年7月。

③ 勃德编《中华今代名人传》，上海传记出版公司，1925。

我们现在还没有什么直接的史料看到杨锡宗和孙中山有什么往来和联系，不过他们既属同乡，杨锡宗积极参与孙科及广州工务局局长程天固主导下的城市建设，杨锡宗与孙中山相识也在常理。而杨锡宗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敬仰深深体现在他后来的一系列建筑设计之中。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葬事筹备处决定向全世界的建筑师和美术家有奖征集陵墓设计图案，并制定《陵墓建筑悬赏征求图案条例》，要求陵墓设计必须“采用中国古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之性质者，或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杨锡宗参加了这次国际竞标，他在《关于孙中山陵墓计划说明书》中总结自己的设计说：“就全部论，计画者刻意求集合中国古代建筑之分子，已成一美丽和一之总体，不特可供纪念，同时关于此项建筑之近代需要，皆能有适当之应付。”最后在国内外应征的40余份设计方案中，杨锡宗的设计获得第三名。评判者之一的凌鸿勋认为杨锡宗的设计“美术方面甚佳，颇合陵墓庄严之意义，独惜与背山形势不称，且过于宏伟，非规定建筑费之所许”。^① 同是留美归来的吕彦直获得了第一名。

1926年1月，广州国民政府在《广州民国日报》悬赏征求“中国国民党总理孙先生纪念碑图案”，杨锡宗参加了这次竞标，并获得了第一名，但可惜杨锡宗获首奖的设计最后只存在于图纸之上。^② 因为两周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在越秀山山顶建筑纪念碑，在山麓增建纪念堂，形成“前堂后碑”的纪念建筑格局，并重新在报上刊登《悬赏征求建筑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及纪念碑图案》。杨锡宗也参加了这次设计竞选，在应征的26份设计中，再次败于吕彦直之下，获得第二名。^③ 1929年，杨锡宗担任广州中山纪念堂建筑委员及管理委员会总干事。

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其墓园规划出自杨锡宗手笔，研究者认为“杨锡宗很好地把握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发理想——民族、民权、民生（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平和叙事般的手法铺陈展开，没有突变，没有刻意的高潮起伏，空间气氛静谧而祥和”。而杨锡宗的另一项设计，广州石牌中山大学新校园总体规划和第一期工程项目则“以钟型平面构图

① 参见《孙中山先生陵墓图案》，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1925年编印。

② 《总理纪念碑图案之获选者》，1926年2月9日《广州民国日报》。

③ 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筹备委员会：《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征求图案揭晓》，1926年9月21日《广州民国日报》。

强调中山先生的临终遗训，并在意象概念上暗示中山大学的历史渊源”。^①

五 结语

本文缕述孙中山与翠亨杨氏相关史事，似乎无关宏旨。翠亨杨氏这些族人，他们和许许多多可能姓名事迹都已湮没无闻的爱国者一样，在追随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为建立独立、民主和富强的中国，都或多或少地作出过贡献。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我们不应忘记他们。

众所周知，研究近代中国史，人物之间血缘、亲缘与地缘的网络关系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孙中山的故乡香山县地处珠三角西岸濒海之地，与澳门这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地区唇齿相依，又是著名的侨乡。由于地缘与人缘的契机，近代香山得风气之先，涌现出大批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重要影响的杰出人物。这些杰出人物不少源出同乡同族，从早期著名的唐家唐氏、北岭徐氏、雍陌郑氏、会同莫氏等四大买办家族，到革命时期的翠亨孙氏、南屏容氏、南朗程氏、翠亨杨氏等，以及建立近代四大百货公司的竹秀园郭氏、沙涌马氏、石岐李氏、外沙蔡氏等家族。这些家族内部及家族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同乡、同族的关系，以及通过联姻等方式建立的亲缘关系，使他们更容易互相建立起信任和认同，建立起利益交织的共同体，这在他们的事业中发挥着不能忽视的作用。加强实地考察和地方文献搜集工作，“织出”其中复杂的关系网，或许有助于对近代中国社会某些运作规则的理解。

作者单位、职务：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办公室主任

^① 彭长歆：《岭南近代著名建筑师杨锡宗设计生平述略》，《华中建筑》第23卷，第124页。